

中央苏区的第一份对日战争宣言

□ 严志伟 马晓敏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江西瑞金发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第一份抗日檄文,标志着我们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宣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扛起抗日大旗的历史担当。

民族危亡时刻的正义宣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随即进攻中国驻军,之后数月东北三省相继沦陷,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之后,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连续发表宣言、决议、文告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犯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彼时,毛泽东即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请假在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毛泽东虽然正在养病,但始终关注中日战争发展态势。当他从报纸得知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后,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抱病起草了《宣言》,愤怒控诉日军“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焚烧中国房屋”的滔天罪行,代表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



1932年4月21日,《红色中华》报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放和独立。”

《宣言》比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了9年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强烈决心。1932年4月21日,这份宣言在《红色中华》报公开发表,经进步报刊转载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揭露卖国行径的正义声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交涉、不抵抗政策,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英法等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31年9月19日,南京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声泪俱下控诉日本侵略行径,乞求国联“裁决”。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议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申诉,西方列强也仅限于口头谴责日本,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国联主导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甚至还荒谬地提出将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化,由各大国共同管理东北

的主张。

相较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退让,蒋介石先后纠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酷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宣言》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并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提出:“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人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4年7月15日,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抗日,瑞金仅用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两轮共计7000名的扩红任务。

《宣言》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本质,让广大民众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真正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利益。

唤醒全民抗日的正义火种

《宣言》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抗日救国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

的共同呼声。同年3月,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会长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进一步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优秀干部奔赴东北,组织领导东北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3年夏,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开展了“募捐3万元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苏区军民慷慨解囊,募集了一批抗日经费和物资。苏维埃政府虽然自身经费不足,但仍从牙缝里挤出经费援助各地民众的反日斗争,单是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就援助了16000元。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

在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毅然走上抗日救亡道路。早在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17000余名官兵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1933年5月2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于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初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察北四县,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振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宣言》犹如黑暗中的一粒火种,点燃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反蒋的爱国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只有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宣言》所倡导的联合抗日理念,为此后《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都化作激励改革者的精神图腾。

非津籍的蒋子龙,却与天津完成灵魂共振,他的作品已与城市文脉共生再造。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秩序与温情交织”的所在,大工业的纪律性消解其对城市的“敌意”,码头文化的粗砺感和极具生活化的城市气息不断滋养着其创作思维。2020年,滨海图书馆内“蒋子龙文学馆”落成,14卷批判史料与《乔厂长上任记》手稿并置,见证了“香花与毒草”的历史辩证法。2021年,蒋子龙出任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创立“蒋子龙文学艺术研究院”,他积极促进文学与工业文化的融合,将工厂遗址转化为文学创作基地,让年轻学子在锈迹斑斑的机床旁感受改革精神的温度。

从天津重型机器厂的锻压车间到中国文坛的高峰,蒋子龙用文字为改革者立传、为时代铸魂。他的作品既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一部中国改革精神的进化史。“作家是炮兵,要轰开蒙昧的壁垒。”这一炮,不仅击穿了传统体制的冻土,更开辟了文学与人民同呼吸的精神战场。在智能制造与元宇宙时代,他留给人们的诘问依然振聋发聩:当物质丰裕消解了生存焦虑,我们是否仍保有破冰的勇气?当虚拟吞噬真实,劳动的尊严何以安放?这或许正是改革文学穿越时空的终极价值。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伟大的长征,不仅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还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长征精神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准备长征和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实现了反蒋斗争与抗日宣传的结合,使全民族抗战思想深入人心,壮大了抗日队伍,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形成作了充分准备。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负起来的时代重任,红军始终是“抗日的先锋、救国的主力”。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纵横驰骋于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青海、河南、湖北、陕西等14省份,跨越了近百条江河,攀越了数十座高山险峰,数次穿越堪称“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冲破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部队的围追堵截,以凶恶的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受无数艰巨考验,战胜党内分裂的严重危机,终于胜利完成总行程约6.5万里的伟大长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也是长征精神的灵魂和核心内容。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是万里征程中千百万红军指战员克服万难、战胜自我、勇往直前的动力。长征时期涌现了一批批为理想和信念而矢志不移的英雄群像。作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率部于1935年1月在怀玉山区遭到国民党军包围,因寡不敌众被俘。在狱中,方志敏坚贞不屈,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写下20余万字文稿,如《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他在就义前的自述中写道,“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将士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换来的。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红军长征时脱离根据地,转战在敌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面临衣、食、住、行方面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了自然界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长征中的作战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在各路红军的600余次战役战斗中,师以上规模的有120余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2人;共计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俘敌2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种人民军队在极端困难时刻表现出的特有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是红军长征赢得最终胜利的重要精神动力。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中国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战争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进行探索,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

长征永远在路上

□ 李懋君

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翻开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新的阶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从实际出发,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胜利;在寻找落脚点过程中,我们党同样不拘泥于既定方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修改原定计划,最终找到了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这是长征胜利的基本保证。长征中广大官兵胸怀全局、心有大我,一切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全党全军上下一心,各支隊伍协调行动,保证了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红军各主力部队之间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队伍内部团结友爱、官兵平等,把困难和牺牲留给自己,将方便和希望让与他人。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厚的战友情谊,使红军队伍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正是这种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将各路红军拧成一股绳,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合力,成功实现了伟大的战略大转移。

充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这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长征唤醒了各族群众,各族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支持。各族群众冒着风险给红军当向导和提供情报信息;节衣缩食,出钱出力,为红军提供粮食及各种物资;主动救治红军伤病员,积极踊跃参加红军。长征中,红军与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红军深入各族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关心群众疾苦,帮助长征沿途贫苦群众;红军践行群众纪律,公平买卖;践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武装各族群众实现翻身解放。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长征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要有这种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蒋子龙：铸就改革文学的钢铁脊梁

□ 张亚勇 吴 迪

蒋子龙是一位从天津重型机器厂车间走出的作家。他以工业文明为墨、改革实践为纸,在文学史上镌刻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图谱。他笔下的改革者形象,既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化,更是中国工业崛起的文学见证。当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中国文坛沉浸于伤痕文学的哀婉时,他执笔投入改革的时代大潮,让文学成为改革洪流的见证者与助推者。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到《镛都前传》,蒋子龙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变革熔铸为一部鲜活的改革史诗。

工业熔炉锻造文学筋骨:车间里的现实主义启蒙。1941年,蒋子龙出生于河北沧县这片尚武之乡。1965年,复员后的他走进天津重型机器厂——这座吞吐钢锭的工业巨兽,成为他文学生命的摇篮。从普通工人成长为车间党总支部书记,这段长达17年的工厂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沉疴积弊:“工业的尊严在于敬畏规则,改革的痛点在于破除惰性。”

在车间熔炉旁,蒋子龙完成了文学启蒙。首任厂长冯文彬雷厉风行的改革者形象,成为其创作的精神原型——为调试万吨水压机坐镇现场三天三夜,命供销科长直闯鞍钢追讨钢管时撂下“完不成任务不见我”的狠话。这些场景后来化作《机电局长的一天》中霍大雷抓生产的改革誓言。白天在机床前挥汗如雨,夜晚于工棚中借着油污的稿纸笔耕不辍。1976年,《机电局长的一天》在《人民文学》复刊第一期面世,这篇小说将工业领域的复杂矛盾搬上文学舞台,被

评论家称为“改革开放文学第一声”。

1979年春,《人民文学》编辑冒雨登门约稿,蒋子龙蛰伏的激情喷薄而出,仅用三天便完成《乔厂长上任记》。小说发表后引发全国轰动,《文艺报》评价其“塑造了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典型改革者形象”,更摘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桂冠。这部作品不仅推动了改革文学潮流,更让“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西北某石化公司经理曾因管理困境收到下属塞入门缝的《乔厂长上任记》,读后彻底整改企业,成为改革佳话。

改革文学的立体勘探:在矛盾漩涡中捕捉时代脉搏。当20世纪80年代文坛盛行伤痕文学时,他毅然将笔触伸向工业体制改革的深水区。面对“工业作家”标签的束缚,蒋子龙断然宣言:“创作不能老念一本经!”突破题材边界,他构建改革者全景图谱:《开拓者》以大型国企改革为背景,揭示了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利益博弈;《赤橙黄绿青蓝紫》通过青年工人的成长,展现了改革浪潮中个体命运的起伏。这些作品以积极向上、雄健刚劲的笔触,刻画了改革者兼具开拓魄力又深陷现实困境的复杂形象,成为观察中国改革进程中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他的创作领域不断拓展,从工厂改革延伸至农村变革。1985年出版的《燕赵悲歌》,以河北农村为背景,塑造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改革者武耕新,该作斩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评论界称为“农村改革的文学教科书”。进入新世纪,他又耗时11年创作《农民帝国》,为穿透乡土中国表

象,他化身农户亲戚深入广东、河南、山东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小说通过郭存先从致富带头人堕落为封建“土皇帝”的轨迹,剖开农村改革狂潮中的权力扭曲与人性复杂变化,记录了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阵痛。

蒋子龙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2024年,他在《天津文学》发表纪实文学《镛都前传》,通过甘肃金川从发现镍矿到建成工业基地的历程,揭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技术突破与精神传承的双重密码。这种持续关注国家发展脉搏的创作态度,使其作品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记录时代变革的鲜活档案。

精神火炬的传承与新生:从文字炼钢到教育铸魂。蒋子龙对文字炼钢般的创作姿态令人动容:为完成《乔厂长上任记》三日未眠,手指磨出血泡;为还原矿工井下生活,他亲赴铜川煤矿千米深井,煤炭笔记化作《开拓者》的鲜活细节。他对读者的感念更显人文情怀:沈阳零下20℃的寒冬,为小书店读者露天签售至手指冻僵;2012年元旦冒雪封路辗转赴京,只为给基层读者作公益讲座。写作室里,翻卷边的《人民日报》合订本堆成小山,重要处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批注,这些素材库见证着其创作与时代共振的激情。

“文学是真相的艺术,要敢于在黑暗中点燃火把。”蒋子龙拒绝粉饰现实,却坚信“批判需以理解与欣赏为前提”。这种使命感让他的作品充满力量:乔光朴整顿工厂时的雷霆手段,霍大道带病抓生产的忘我精神,